引　言

——“人生”应当成为文艺研究的独立视角之一

把“人生”作为文艺研究的一个独立视角，似乎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常识性问题，其实不然。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是合二为一浑融一体的，人生问题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即人生问题，于是，“社会”遮蔽了“人生”，“人生”淹没于“社会”的汪洋大海中。

事实上，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叉又相互区别。就其交叉来说，是指任何人都在特定的社会中生存，其人生也在社会生活中展开和完成，离开了社会，人失去生存环境，也就无所谓人生；而社会是由众多人组成，社会生活也就是众多人的活动，离开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人生，也就无所谓社会生活。就其区别来说，“社会”具有特定的时空性，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人的生存活动构成特定社会的生活内容，时空变迁，社会生活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此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人生”则不受特定时空的限制，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如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人生困惑、人生困境、人生命运、生老病死等等；再如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灵与肉的冲突，出世与入世的两难，人的欲望无限而实现欲望的能力却有限，人与人之间有沟通的要求却永远不能彻底沟通，人永远在追求理想却永远达不到理想，人都不想死却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得不死，诸如此类，都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它不以时代、民族、职业、贫富等等的不同而不同。换句话说，只要是人都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问题即人生问题。人生问题具有永恒性，共同性，普遍性，超越性，人生问题与生俱来与生俱去，只要人存在，人生问题就与之共在。“人生”与“社会”的关系，打个比方说，人类的生存是一张网，这张网的经线是“人生”，纬线是“社会”；经线永远贯穿始终，而纬线却不断变换色彩，这就有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人各不相同的生命内容。

文学艺术以人的生存活动为表现对象，文艺学以文学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文学艺术作品生动具体地表现出人的生存之网的复杂，而我们的文艺研究却往往只看到了其中的“纬线”而忽视了贯穿其中的经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疏忽，一个极大的遗憾。

造成这一疏忽，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从理论上说，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资源主要有：西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俄国以车、别、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上几家理论共同点是强调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从社会历史原因看，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要求文艺对社会生活承担责任，要求文艺促进社会生活的变革。这些都是合理的，应当予以肯定。今后文艺还应当继续承担这一使命。但是仅仅要求文艺反映“社会”，文艺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社会学视角，已经远远不够。社会学视角已经暴露出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现在我们应该拓展视野，把“人生”作为基本视角引入到文艺学的研究之中。

如猪八戒，社会视角视他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典型，而人生视角则可以视他为表现人性弱点的典型。猪八戒好色，自私，贪吃，惫懒，贪小便宜，爱弄小巧，搬弄是非，但也能吃苦

耐劳，憨厚拙朴等等，这些都是普通人常见的性格特点，其缺点因其普遍性而可视为人性的弱点。从人生视角看猪八戒，既可以从创作角度解释这一形象为什么塑造得成功，也可以从接受角度解释为什么虽然有那么多缺点，却又大受读者、观众的喜爱（据央视披露，有人在某地向 98位青年女性作调查，如果在唐僧师徒四人中选伴侣，你选谁？结果唐僧得票为 0，孙悟空 14，沙僧 10，猪八戒 74）。孙悟空，社会视角视他为敢于向统治阶级和一切黑暗势力反抗和斗争的叛逆英雄；但从人生视角看，人们则通过他体验到一种大胆破坏一切规范的乐趣，体验到在想象中宣泄压抑的快感。孙悟空、鲁智深、小燕子（《还珠格格》）等形形色色以反叛和无法无天为内容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大抵都与人们宣泄的要求有关。再如《白蛇传》，从社会视角看到的是歌颂爱情的忠贞，批判破坏爱情的封建恶势力。从人生视角则可以从白娘子形象的塑造上（美女蛇，有美与可怕的双重性），看到一般男性深层心理中对女性既爱又怕的矛盾心态——总之，同一个作品同一个形象，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能会看出另一番新天地。

因此，“人生”应当成为文艺研究的独立视角之一。这一视角将极大地开阔文艺研究的视野，更逼近文学艺术的本质，从文学艺术中发掘更深层的精神内涵；同时也更有利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从而极大地丰富我们的人生智慧，使我们活得更清醒更自觉更幸福更快乐，更有价值和意义。

原载《文艺报》 2001年1月13日

理想主义者的自我调侃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传世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品故事梗概如下：

堂吉诃德本是西班牙拉·曼却地区一个穷乡绅，酷爱骑士小说，竟然变卖土地遍搜天下此类书籍，终于走火入魔，满头满脑全是骑士行迹，而且全都信以为真，敬佩、羡慕之至。他感到自己也应该像骑士一样肩负神圣使命，闯荡天下，匡扶正义，锄暴安良，于是断然决定要做游侠骑士。他骑上自己家皮包骨头的老马，取名堂吉诃德，模仿骑士传统把邻村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养猪姑娘定为心上人，决心终生为她服务，还找了个邻居桑丘作他的侍从。一切齐全，他离开家乡闯荡天下。在他眼里到处都是妖魔鬼怪，都是他冒险的机会。他把风车当作凶恶的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把被押送的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旅店当作城堡，把旅店里的皮酒囊当作巨人头，把傀儡戏舞台当作战场，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他打抱不平的结果不但与人无助，还处处给人带来灾难，自己也吃尽无数苦头。就这样他过了半生游侠梦，临死才清醒过

来，对人说自己过去是疯子，以前成夜成夜读的那些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只恨自己悔悟太迟，来不及再读可以启发心灵的好书。告诉外甥女不许嫁给骑士，否则不得继承他的遗产。

关于《堂吉诃德》的思想意蕴，作者自己说是为了讽刺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要让天下人都讨厌它，从而“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作品发表后，果然不出作者所愿，骑士小说真的奇迹般地消失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实现了。

打击骑士小说，是作者的主观动机，也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但是《堂吉诃德》的思想意蕴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一个客观的精神存在，就有了独立于作者的艺术生命。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它生存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与各不相同的接受者对话，从而激发出各不相同的理解。这些各不相同的理解，其实都可以视为作品的思想意蕴，或者说是其中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流行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及有关论著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大体上是这样的：作者把堂吉诃德荒诞离奇的游侠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公爵夫妇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通过对他们行径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和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的阴险、凶残的本性。作者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活不下去、官逼民反的真情，诅咒当时的时代是“可恶的时代”。至于堂吉诃德，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喜剧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各种美德，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要求，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参见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第94—9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以上论断是从社会、政治角度看问题，所以一般是从阶级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析入手。有人从哲理角度分析，认为堂吉诃德身上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些深刻矛盾，如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书本与实践的矛盾、精神与物欲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商的矛盾等等。有人从历史和宗教角度分析，认为面对邪恶势力和愚昧势力的强大，堂吉诃德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把自己个人的力量想象得比环境的力量还大，自愿捐躯受罪来匡扶正义，就多少接近于基督式的宗教英雄。在他身上既体现了骑士道精神中崇高的一面，又代表了骑士精神中可悲的一面。如此等等。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读者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观察《堂吉诃德》，对它的理解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穷尽了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歌德说过，优秀的作品是无论如何探测也探不到底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经得起永远探讨的作品。

这里，笔者从人生视角进入作品，谈几点随机的认识（不作全面分析）。

一、理想主义者的自我调侃

说堂吉诃德性格中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因为这一点在作品中表现得太突出太鲜明了。他身为一个穷乡绅，平民百姓，游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本可以安享悠闲平静的田园生活；但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传奇，激发出他救国救民的伟大豪情，他立志效仿古代游侠闯荡天下，救世济人。在这一崇高理想的支配下，堂吉诃德开始他的行侠生涯，结果处处碰壁，闹出说不完的荒唐滑稽的笑话，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堂吉诃德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理想脱离社会实际形态，脱离正常人的思维，完全游离于人情世故之外，所以是一厢

情愿的空想、幻想。在堂吉诃德这里，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是完全分裂的，结果必然导致动机与效果的错位。

一边是伟大崇高的理想与动机，一边是处处碰壁的现实与效果，这一悲剧性的对立，堂吉诃德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所以一直充满热情，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直到临死前才明白过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荒诞与滑稽，这才有了所谓的清醒。清醒后的堂吉诃德承认自己以前是疯子，头脑发昏，干了傻事。

一边是伟大理想与动机，一边是彻底失败的现实与效果，这一悲剧性对立在堂吉诃德这里当然有其个别性和偶然性——他因读骑士小说入迷，把艺术当现实，以幻为真啦！然而，走出堂吉诃德的故事面向普遍而广阔的人生，我们发现，上述悲剧性对立并不只存在于堂吉诃德身上，而是发生在许多人身上；这一对立也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只不过“对立”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堂吉诃德不一样，但就其悲剧的性质而言，却是一样的。

例如《堂吉诃德》的作者本人，就同样陷于上述悲剧性“对立”之中。据史料介绍，塞万提斯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医生之家，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有机会读了很多骑士小说，头脑里形成了非常狂热的为国捐躯的理想。他参加了无敌舰队，投入了抗击土耳其侵略的战争。在战争中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敢，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强壮，武艺也不高明。在和土耳其军对阵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上敌人的军舰，而后继者没有跟上来，他被包围，身负重伤，左手残废。这是他第一次英勇参战。接着他又参加了占领突尼斯的战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海战。在这些战役中他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可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遇到海盗，被俘后

被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五年苦工。一个做着将军梦的人沦为了奴隶。他两次谋逃没有成功，后来一位神父募捐了一些钱，把他赎了出来。当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里找到了一个军需职位。一次，他下乡催征粮食，被乡绅诬陷入狱。出狱后改做税吏。他把收上来的税存在银行里，偏偏这个银行倒闭了，塞万提斯因此第二次入狱。从监狱出来之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此时他已经人过中年，百事不成，万般无奈之下开始了《堂吉诃德》的写作。作品第一部发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命运。因为他不懂和出版商打交道，几乎所有的钱都落入出版商手中。为了打击伪造的《堂吉诃德》，他在极度愤慨的情绪之下开始写作第二部。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完成后即一病不起。

一个胸怀远大理想却一生倒霉的人，当他回首平生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心态呢？他或许会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未悔”；或许像艺术人物堂吉诃德那样“一生惑幻，临殁见真”，彻底否定了自己；然而更多的似乎是心情复杂，感慨万千：承认失败又不情愿，既后悔又不后悔，口头上激愤地否定自己而内心却可能恰恰相反。具体表现为自我嘲笑自我调侃—— 我这人啊，简直是一个疯子，一个傻瓜，一个活该倒霉的人。如果用一个艺术形象去表现，即活活一个堂吉诃德。

自我嘲笑自我调侃，我感到比较接近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时的心态。塞万提斯创造了堂吉诃德但不等于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意象”，他的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堂吉诃德的精神中寄托着塞万提斯的理想，堂吉诃德的“清醒”中暗含着塞万提斯的自嘲。但堂吉诃德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自己的自我否定。现实表现是，他虽然在生活中

“屡败”，但却依然“屡战”，直到临终前还在与世界抗争——抱病写完《堂吉诃德》第二部。

关于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精神联系，作品的译者杨绛先生曾有过深入的分析。她说：“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予堂吉诃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堂吉诃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堂吉诃德·译者序》第 1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版）这里所说的“有些品质”，我以为主要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共同的精神品质使作者与人物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样，就使角色身上流淌着作者的精神血脉：“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像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描摹。”（译者序第 14 页）

事实正是这样，塞万提斯从自己辛酸的人生体验出发准确“描摹”了角色堂吉诃德，或者说，他写堂吉诃德其实是在写他自己，他“笑”堂吉诃德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解嘲，自我调侃；所以他对堂吉诃德既同情又怜悯，既赞扬又嘲笑，他一边笑着讲故事，一边心中在流泪，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从本质上说，《堂吉诃德》是表意小说而绝非写实小说——虽然其字里行间也描摹了西班牙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者是在借堂吉诃德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所以我认为《堂吉诃德》是作者自我解嘲自我调侃之作。

如果《堂吉诃德》仅仅是作者自我解嘲自我调侃，那么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价值和意义也就十分有限了。事实是，塞万提斯说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打击骑士小说，骑士小说早就如其所愿消亡了，然而《堂吉诃德》却依然辉煌；我们过去总是说作品价值在于揭露、批判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准确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今，当时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堂吉诃德的故事却依然有魅力，原因何在？道理很简单，因为《堂吉诃德》中有一些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超越民族从而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我以为就是成功地提炼出了一种“心态”，即壮志未酬的理想主义者回首往事时的自我解嘲、自我调侃。

塞万提斯自我解嘲自我调侃的心态，被自作品发表至今的读者很容易地理解了，接受了。读者以堂吉诃德为镜子对照自己，对照别人，每当发现自己或别人身上有着超出常人的崇高理想和热情然而却屡屡失败无可奈何之时，总是首先想到堂吉诃德，称自己是堂吉诃德式的人。这样的自我评价中包含了对《堂吉诃德》精神实质的理解，包含了与作者内心深处的相通。“堂吉诃德”已成为上述心态的共名符号。

理想主义者自我嘲笑自我调侃的心态来源于残酷的现实——理想的崇高与现实的失败。残酷的现实来源于人类永恒的根本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与冲突。这一困境永远摆在人类面前，给人类以折磨也给人以激励。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包括精神史），其实就是与上述困境相周旋的历史。人们永远在追求理想，为理想竭尽所能，百折不回，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理想的高远总是可望而不可即，总给人以挫败感和失落感。无奈中的人们只好自我解嘲自我调侃，但嘲笑和调侃中又不甘心认输，不真心放弃，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理想，是痛苦的源泉，也是欢乐的源泉。

理想与现实对立的困境不灭，理想主义者自我解嘲自我调侃

的心态不灭，《堂吉诃德》也就不灭。三者相生相伴，直至永远。

二、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用在堂吉诃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对于堂吉诃德来说，他之迷于其中的“局”是骑士小说世界。他读骑士小说读得失去理性，“满脑袋尽是书上说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调情呀、痛苦呀等等荒唐无稽的事”；而且，他还固执己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事情若仅止于此，他的荒唐还只是在思想认识层面上，更可怕的还在于，他对于小说中骑士的豪侠行为由思想上的着迷发展到行为上的模仿。从此，现实世界的一切在他那里全变了形，全被他置换为艺术世界的相似物。行侠过程中无论遇上什么他都要与小说世界做类比，他严格按照书上写的、骑士应该做的要求自己，认真严肃，毫不苟且。哪怕为此吃尽苦头也不改初衷。他不仅模仿骑士行侠，而且模仿骑士发疯。骑士是有缘有故发疯，他要无缘无故发疯，他比骑士走得更远，以求名扬千古。

堂吉诃德的行为，在头脑正常的人看来是不折不扣的神经病，但他自以为很正常，而且以为别人皆糊涂，唯有他正常。明明是他把看到的一切都歪曲了，变形了，颠倒了，他却认为别人把事情看错了。他对自己的行为特别自信、坚定、毫不怀疑，因为他生活于自己心造的世界里。在这里，一切自有自身的逻辑。例如，一只理发师的铜盆，他偏认作是曼布利诺的头盔。为什么？堂吉诃德的解释是：“因为我们身边老跟着一大群魔术家，凡是和我们有关的事物，他们都要变化，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全看他们是存心帮我们还是害我们。所以你看来是一只理发师的铜

盆，我看来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在别人眼里又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呢，那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卫护我的那位魔术家叫大家看作一只理发师的铜盆，这是他特别照应我。因为那只头盔是了不起的宝贝，人人都会追着我来抢我的。如果他们看着不过是一只理发师的盆儿，就不要了。”（第 207 页）

听了堂吉诃德的解释，谁能说他是荒唐可笑，没有道理呢？！在他那个世界里，他自有逻辑，一切都能自圆其说。

堂吉诃德如此荒唐又如此自信，原因就在于“当局者迷”——他迷于他自造的世界里。他的世界自有规则，所以他自信；而他的世界虚幻不实、与客观现实相脱节，所以他荒唐。他的世界和常人的世界不相通，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

类似堂吉诃德这种“当局者迷”的现象在人类生活中难道是少见的吗？常常看到政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明明错了，却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一意孤行走到底，撞死南墙头不回。他们所以如此固执，原因在于他们以为自己有道理，而且只有自己有道理，世人昏昏我独醒。看来，“当局者迷”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是人类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

“当局者迷”的错误，错不在“自我”，错在“迷于”自我，错在自我与客观实际相脱节。生活中的人，作为认识主体、行为主体，都有一个“主观”，一个“自我”，而且都特别容易相信自己的“主观”和“自我”，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你的主观一定要与客观相符合，你的自我一定要与世界相接轨。客观世界是十分复杂的，要想彻底认识它、把握它进而驾驭它、改造它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人们必须走出自我，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在实践中接近它、认识它。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认识论角度，人们切不可过于自信，不可执迷于自我

而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应该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三、人性的实验与理解

在《堂吉诃德》中，作者用将近三章的篇幅插入了一个名为“何必追根究底”（有译本译为“无谓的猜疑”）的故事。其梗概大致如下：

意大利弗罗伦西亚（通译为佛罗伦萨）城有两位富贵公子：安塞尔模（以下简称安）和罗塔琉（以下简称罗）。两人情投意合，交情甚深，人称“朋友俩”，用中国话说即“铁哥儿们”。安爱上了一位高贵美貌的小姐卡蜜拉，在朋友的说合帮助下如愿以偿地结了婚。安结婚之后，罗为朋友的名誉考虑，出入安家的次数逐渐减少。安觉察后大加埋怨，说早知道结婚会妨碍朋友往来，宁可一辈子不结婚，于是他请求罗仍像以往那样随意出入他的家。但罗行为谨慎，唯恐别人说闲话，他诚心诚意地维护朋友的名誉和他们的友谊。

有一天，两人在城外散步，安向罗吐露了一桩隐秘而强烈的内心愿望。他说自己有富贵的家庭，贤德的妻子，忠诚的朋友，万事如意，按理该感谢上苍，可是他内心深处却苦恼不堪。因为，“不知从哪天起我心上纠缠着一个离奇古怪的愿望”，那就是，“我想知道我的妻子卡蜜拉是否真像我想的那么贞洁、那么完美。我无法证实。金子要经过烧炼，才见得成色好坏；她照样也得经过考验，才见得她的节操。”他认为“一个女人得有人追求，才能断定她是否贞洁。她如果对情人的许愿、送礼、流泪、日夜的纠缠不迁就，那才算坚贞。女人如果没人引诱她的不正经，她的正经有什么希罕呢？”（第 297 页）为此，他想让妻子

受些考验，受些引诱，他请罗来充当这个引诱她的人，而且要求罗无论如何帮助他完成这桩心愿。

罗认为这是利用朋友干违反上帝的事，不但愚蠢而且卑鄙，这样做会既毁了妻子又毁了自己，还毁了友谊，苦口婆心劝安放弃这桩心愿。但安打定主意要做这番实验，执意要求罗按他的心愿去做。万般无奈之中罗答应了安的要求。

安安排机会和时间让罗和卡蜜拉亲密接触，还备了钱和首饰让罗送给卡蜜拉。罗口头上答应，行动上却不照办，虚意应付。安发现后大为不满，指责罗不该骗他，说他辜负了自己的信任。罗很内疚，发誓按他的要求做。

为了给罗更方便的条件，他故意离开家，请罗帮助照料家务，陪妻子吃饭，而且强迫妻子接受自己的安排。开头几天，罗什么也不讲，卡的贞静、端庄和安详也让罗不敢轻易开口。但是，面对美貌贤淑的卡蜜拉，“石头见了她也不免动情，何况血肉之身呢。罗塔琉照理可以跟她说话的场合，只把她看了又看，觉得她真可爱。这个念头渐渐地侵蚀了他对安塞尔模的忠实。他千番百次想出城到别处去，叫安塞尔模一辈子见不到他，他也一辈子见不到卡蜜拉。可是他见了卡蜜拉又喜又爱，已经撇不下、离不开了。他极力克制自己这种贪恋之情，只顾天人交战，独个儿就责备自己疯了，骂自己不够朋友，甚至不是好基督徒。”（第 310 页）就这样，他在安离家后头三天还只是内心交战，竭力要克制自己的爱情。可是以后他无论如何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于是不顾一切，率意而行，如痴如狂地向卡蜜拉说起疯话来。

面对罗的疯狂进攻，卡坚守阵地，写信向丈夫暗示罗的无礼，请丈夫赶快回来。安知道后不但不担心反而暗自高兴，拖延着不回家，还命令妻子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家，她只好留下来，为免佣人猜疑也不再躲避罗。“罗塔琉抵死纠缠，使卡蜜拉渐渐心

软。他流的泪，说的话打动了她的怜悯。她十分克制，眼睛里才没流露感情。罗塔琉都看出来了，越加热情如火。 —— 他称赞她美，借以打动她的虚荣；因为这点虚荣最能抵消美人的高傲。他紧攻紧打，用猛烈的火力来突破卡蜜拉的坚贞；她即使是铁人儿也抵敌不住。他流泪，央求，献好，赞美，纠缠不已，显得他一往情深，满腔热情，竟使卡蜜拉贞操扫地；他意想不到而求之不得的事，居然成功。”（第 312 页）

—— 就这样，在安的要求和设计下，一对坚贞如铁的人，在爱情的考验也可以说是诱惑之下，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成了爱情的俘虏。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一波三折，惊险离奇：罗出于猜疑和嫉妒出卖了卡，后悔，向卡坦白，为掩饰他们的关系，共同设计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苦肉计。卡假装要杀罗，不成后又假意自杀，骗局演得天衣无缝。后来，卡因怕女仆揭露真情，仓促间与罗一起出逃。卡进了修道院，罗为逃避良心的谴责死在战场上。知道真情后的安，精神崩溃，伤心而死。死前留下遗言对自己行为表示忏悔：“我愚蠢无聊的愿望送了自己的性命。假如卡蜜拉听到我的死讯，我希望她知道我原谅她。因为她没有义务创造奇迹，我也没有必要这样要求她。我的耻辱是咎由自取。”知道这一切的卡蜜拉因悲伤太过，不久也死了。

这则相对独立于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故事相当完整，既曲折诱人又引人思考。幸福美满的一对夫妻和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竟然毁于一个偶然的念头上，这个念头的荒谬绝伦可想而知。这大概就是故事的表层意蕴：对于珍贵的东西要爱护珍惜，千万不可无事生非，胡乱猜疑。就像得到一颗宝石，最好是珍贵地加以保存，千万不可再放到钻石上用铁锤击打。宝石经得住击打，宝石还是宝石，并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和光彩；如果碎了—— 这是可能

的，你就一无所有了。这其实就是传统故事中惯有的劝世之言。讲一个故事，暗寓一个做人处世的道理。这种做法，中外相通。

但故事的寓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训诫，它让人想得更远更多。安、卡的婚姻是美满的，卡对安的爱情也是坚贞的；安、罗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不掺一丝杂念的。但为什么后来都经不住考验，一个个都打了败仗呢？叙述人的解释是这样的：“要克服爱情，只有逃走一法，谁也不该和这样的强敌交手。因为人性使然，只有神力才能克服。”（第 312 页）这就是说卡背叛丈夫、罗背叛朋友原因是一样的，即——人性的软弱。卡、罗的道德境界，在安设计的考验之前，应该说都是高尚的，纯洁的，不容怀疑的。关于这一点叙述人用大量篇幅作了反复交待。但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两人都败下阵来，可见所谓“忠贞”、“忠诚”这些高尚的道德品质，在人的本能性欲望面前，是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

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对人性的拷问是冷酷的，严峻的，结论是足以让道德家尴尬的。不仅如此，更让道德家感到吃惊的是，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对人性的软弱不是义正辞严的指责，而是充满温情地辩护。作者认为，要求人在爱情的诱惑面前像圣人一样不动心，是不近人情、违反人性的，等于从死亡求生命，从衰病求健康，从牢狱求自由，向叛徒求坚强，一句话，是在“追求不可能的事”。正如罗劝安时所说的，卡蜜拉好比蕴藏着贤惠、美丽、贞洁、幽娴等等品德的宝矿，你应该小心谨慎地爱护她，而不应该不顾矿井倒塌的危险还要挖下去，由新的矿脉里找新的、从来没有的宝藏；她那个矿井只靠她脆弱的天性做支架，是很不牢固的。（第 308 页）总之一句话，在作者看来，人就是人，既不是兽也不是神；拿神的标准要求人，是荒唐的，其失败是必然的。故事中具有荒唐之念的安，临死前悟到了这一

点，承认自己的“实验”是愚蠢的、无聊的，自己不该向妻子提出超出人性限度的苛刻要求，“她没有义务创造奇迹”（言外之意，在诱惑面前不动心是奇迹，动了心是常态），因此自己的耻辱是“咎由自取”……

在这个故事里，安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真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本该得到最多的同情，但作者对他的责备超过同情，既可怜他又埋怨他，说他活该。相反，对犯了“错误”的卡和罗，作者却是理解多于批评，同情多于指责。作者的这种情感倾向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思潮。由于这一思想合乎人情人性，所以被后来的思想家、文艺家所继承。如尼采在他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就明确说道：“不要在道德上超过你们的能力！不要寻求违反你们的可能性的东西！”（转引自《周国平文集》第 3 卷，第 171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明显是“编的”，有点不合情理，让人不信真会有这种事。但是，正因为这种“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这种与真实生活的距离感，才显出故事的虚拟性，表意性，才让人从中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对人生、人性的理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